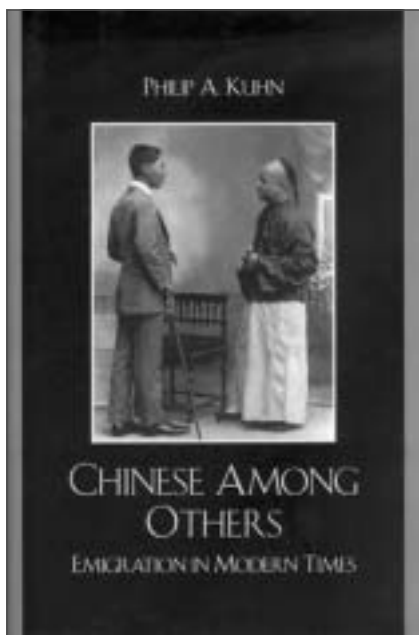


卻恐他鄉勝故鄉

——評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 梁加農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1990年代末，孔飛力(Philip A. Kuhn)因《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①的中譯本出版而見知於中文讀者。2008年，孔飛力從哈佛大學歷史暨東亞語言文化研究講座教授職位上退休後，又出版了《生活在他者世界的華人：現代的人口遷徙》(*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以下簡稱《華人》，引用只註頁碼)，是他近年研究「海外華人」這個大課題的最新成果。

《華人》是一部敘述近五百年華人(中國人)向海外世界各地遷徙的歷史專著。全書共八章：第一章「海外擴張與華人向海外遷徙」介紹華人向海外遷徙的社會歷史背景。第二章「早期殖民帝國與海外華人社區」主要敘述十九世紀中葉之前華人向東南亞西方殖民地的遷徙。第三章「帝國主義時代與大規模海外遷徙」、第四章「大規模海外遷徙時期的海外社區：(一)東南亞」和第五章「大規模海外遷徙時期的海外社區：(二)排華的移民國家」分別講述十九世紀中葉至1920年代華

《華人》是一部敘述近五百年華人(中國人)向海外世界各地遷徙的歷史專著。「下南洋」在中國歷史悠久，也是《華人》一書著墨最多的內容。華人向海外遷徙，實際上是中國居民外出經商或打工的自然延伸。

孔飛力在書中所探討的「他者世界」，指涉的是海外華人定居地的經濟生活、文化傳統及對華人定居的態度等，《華人》一書就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他者世界的變遷對海外華人的影響。

人大規模海外遷徙時期的歷史，以及華人作為錫礦工人、橡膠、甘蔗種植園工及中介商人等在東南亞和主要作為契約淘金勞工越洋到美國、澳大利亞社區的異同。第六章「革命和『救國』」和第七章「後殖民時期的東南亞華人社區」討論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革命、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進據東南亞，以及戰後殖民地國家的獨立對華人社區的影響。第八章「新移民」着重探討1960年代中期開始的台灣、香港移民潮及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移居西方發達國家的新移民問題。下面簡要介紹《華人》的主要內容，並略加評論和補充。

一 下南洋

1990年前後，居住在中國大陸以及台灣以外136個國家的華人約有3,700萬。其中70%以上居住在東南亞，僅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三個國家，華人就佔全部海外華人總數的一半(頁2)。這三國在地理上都屬東南亞南部，所謂「島嶼東南亞」，亦即中國傳統通稱的「南洋」。「下南洋」在中國歷史悠久，也是《華人》一書着墨最多的內容。

華人向海外遷徙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早在五百年前就出現了。實際上，它只是中國居民外出經商或打工的自然延伸。因為在很長時期裏，華人並沒有西方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所確立的「民族國家」概念。向海外遷徙的也主要是東南沿海一帶海通便利、毗鄰南洋的居民，自北而南

集中在五個地區：浙江省甌江口的溫州、福建省閩江端的福州、福建省廈門港周邊的泉州和漳州、廣東省汕頭港所在的潮州，以及先以廣州後加香港為出海口的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頁32)。

華人向海外遷徙既與國內社會經濟形勢有關，也與海外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相聯繫。十九世紀中葉之後的華人大規模海外遷徙，首先是與西方東向擴張、在東南亞建立殖民地相關的。英國殖民地馬來亞(包括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和荷蘭殖民地印尼等地先後發現錫礦和建立橡膠、甘蔗種植園，刺激了對勞工的大量需求。十九世紀初在印尼的華人就有十萬(頁62)；到十九世紀中葉，爪哇島上已是華商雲集。從1882到1932年半個世紀的大部分年份裏，每年遷徙到英屬馬來亞的華人都超過十萬(頁148)。

遠優於故鄉的經濟環境，使大批遷徙海外的華人定居他鄉，也就產生了與他鄉世界的關係問題。孔飛力在書中所探討的「他者世界」(others)，指涉的是海外華人定居地的經濟生活、文化傳統及對華人定居的態度等(頁4)，《華人》一書就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他者世界的變遷對海外華人的影響。

十九世紀中葉之後大規模遷徙到東南亞的華人，主要從事商業、礦業及各種中介活動。在荷屬印尼，華人還被置於管理當地原居民的位置。他們實際上處於「二等公民」的地位，即低於建立政治經濟體制的西方殖民統治者，又高於主要從事農業種植生產的當地原居民(頁291)。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之

二 「印尼模式」

後，隨着殖民統治的終結，這些新獨立的國家往往將華人視為西方殖民統治的既得利益者和支持者，產生了廣泛的排華情緒，並進而出台過一系列排華政策。1959年，印尼出台禁止華人在農村從事零售業務的法規後，超過十萬華人被迫回到中國大陸（頁289），是為「印尼歸國華僑」的一個重要來源。1970至1990年，馬來西亞推行「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硬性規定馬來人在經濟活動中享有一些優先權（頁292）。孔飛力在書中詳細分析了這些他者世界變化的來龍去脈，還將之與未曾經歷殖民統治的泰國的華人問題作了對比。

泰國（1938年前稱暹羅）沃野千里，早有華人遷徙。不過，大量華人定居泰國是在1855年《寶靈條約》（*Bowring Treaty*）簽訂之後（頁149）。暹羅王國被迫與英國簽約開放自由貿易後，經濟快速增長，刺激了對勞工，尤其是當地原居民中稀缺的技工、貿易及中介人員的需求。經由曼谷與香港等中國條約口岸的新航線，大量華人遷徙到泰國。

此外，與信奉伊斯蘭教的印尼、馬來西亞等地不同，泰人信奉佛教，與華人相近。泰、華兩族之間通婚也較多。而且，泰人無意經商，商業遂成華人安身之所，雙方沒有利害衝突（頁299）。雖然1911年中國發生的推翻清皇室的辛亥革命及1918至1930年泰國華人社區人口激增五十萬，都曾引起泰國王室及其後的軍人執政集團的不安，但華商及其專業服務，仍為社會不可或缺，因此，泰國的排華情緒不似印尼等地強烈（頁315）。

儘管排華活動在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地時有發生，但在1960至1990年代，華人在馬、印等地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不降反升。孔飛力就馬來西亞的這一現象做出的一個解釋是，當地華人佔人口的25%，「新經濟政策」法不責眾（頁295）。而印尼華人僅佔人口的3%不到，其成功很大程度上與華人上層富商的經營模式有關（頁300-304）。

孔飛力分析說，印尼華人富商除了引進當地人到企業管理層外，主要搞官商結合的「主公」（*cukong*）經營模式，即華商自己以政府高官（尤其是佔統治地位的軍方將領）客戶的名義，從政府獲得合同，獨自完成後將部分利潤分給高官（頁301）。印尼首富林紹良就是軍人總統蘇哈托（*Suharto*）的客戶之一。

來自福州鄰縣福清的林紹良，早年曾售運物資給獨立戰爭中的印尼軍隊，因此結識了當時還是中級軍官的蘇哈托。蘇哈托在1965年「九三〇事件」中血腥鎮壓印尼共產黨、濫殺無辜華人上台後，實行軍人專制統治「新秩序」（*New Order*），執政三十年。蘇哈托在文化上全面壓制華人，禁止中文學校、報紙和華人社團。所有華人都被要求取用印尼化姓名。不過，印尼政府在經濟上網開一面，林紹良等華人富商與蘇哈托等軍事強人官商結合，如魚得水。當地華商如在中國一樣，清楚地知道怎樣運作商業權勢而又不觸犯後者的政治領地（頁302）。印尼華人資本由商業、工業而銀行業，並進而與國際資本結

儘管排華活動在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地時有發生，但在1960至1990年代，華人在馬、印等地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不降反升。一個解釋是馬來西亞「新經濟政策」法不責眾，而印尼成功很大程度上與華人上層富商的經營模式有關。

《華人》沒有敘及有大量華人定居的南美、南非、南亞等地。就是篇幅最多的東南亞，也幾乎未提及當地華人1960至1970年代在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支持下捲入共產革命的重大史事。

合，進一步加強了自己的經濟地位（頁300）。

孔飛力認為，在印尼高度個人專制的政體下，上述官商結合的做法無人敢於非議；但放到民主政體裏，則會被指責為貪贓枉法（頁301）。不過，這裏有一個問題作者沒有談到，那就是作為蘇哈托政權長期支持者的民主美國，對此怎麼看？有關的一個主要背景是，在1960至1970年代全球冷戰格局下，美國出於抗拒蘇聯、中國和東南亞共產主義影響的戰略考慮，支持印尼軍人專制下實現現代化的發展道路^②；由此，對印尼體制內的這種腐敗現象，可能也就聽之任之。

三 共產革命

作為國際學界第一部從全球視野研究「海外華人」這個大課題的宏大歷史敘述，《華人》自然也有一些缺憾。在地域上，該書沒有敘及有大量華人定居的南美、南非、南亞等地。就是篇幅最多的東南亞，也幾乎未提及當地華人1960至1970年代在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支持下捲入共產革命的重大史事。事實上，印尼「九三〇事件」和緬甸、泰國、柬埔寨、馬來亞及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的反政府武裝，都曾嚴重影響當地華人社區。

1920至1940年代，共產革命席捲中國大陸。其時，華人來往東南亞基本自由；經由香港與新加坡等海上航線，如果乘坐三等艙的話，連護照都不需要。中共組織活動也開始進入當地華人社區。在1940年

代，著名報人、秘密黨員胡愈之曾受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派遣前往新加坡，擔任由華人富商陳嘉庚創辦的中文報紙《南洋商報》編輯主任^③。1942年成立的泰國共產黨中有不少華人，海南島出生的中共黨員李啟新為第一任總書記^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與東南亞共產黨的組織來往開始受限，但負責海外情報工作的中共中央調查部，曾在東南亞華人中秘密發展組織^⑤。不過，1950年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基本上「和平共處」。中國還宣布不再承認過去遺留的海外華人雙重國籍，並與印尼簽訂協議，要求印尼華人只能選擇印尼或中國一國國籍（頁330）。但在1960至1970年代，由於中蘇分裂及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中國又曾大力向東南亞「輸出革命」。

在馬來西亞，當地出生的華人（馬來語通稱為“Peranakan”，以別於純粹從中國遷徙來的華人“Totok”）是馬來亞共產黨的一個主要來源，其中陳平曾長期擔任馬共總書記。陳平在近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披露，1960年馬共本已打算放棄武裝、與政府講和，但在中共的勸說下又重返叢林。其後十多年，陳平長住北京，在中共的思想指導和物資援助下（包括設在中國湖南以馬、泰、華、英語播音的短波電台），遙控指揮馬、泰邊境的馬共游擊隊^⑥。他在接受中國歷史學家李丹慧的訪問時還說，當年中共給馬共鬧革命的錢多得「數到手軟」^⑦。數以千計華人因此捲入暴力革命，造成無數家庭悲劇，也加劇了當地社會對華人的戒心。直到1980年代中共不再

「輸出革命」，馬共才回頭與馬、泰政府講和。

1970年柬埔寨發生政變，國王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被推翻。在中國的大力支持下，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在戰亂中迅速崛起。其二號人物英薩利(Ieng Sary)具有部分中國血統，還曾持有化名「蘇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⑥。在1975至1979年間，紅色高棉一度據有全國政權，曾大肆清洗在柬埔寨的華人。不到四年，柬埔寨華人人數銳減一半，21.5萬華人死於非命^⑦，包括曾任柬共政府部長的華人符寧等^⑧，而中國對此卻基本未加干預。其後倖存的華人，大多數是被柬共政權從城市趕到農村的原零售店主，在越南軍隊入侵、柬共政權崩潰時成千上萬地越過邊境逃亡泰國，再輾轉遷徙到西方國家^⑨。

四 新移民

在中國大陸，「新移民」通常指1978年改革開放後移民海外者。《華人》一書將之上溯至1960年代中期開始的台灣、香港移民潮，中國大陸開放後出現的移民潮只是步其後塵而已。所謂「新」，是指相對於過去「下南洋」而言，這些新移民教育程度和專業技能較高，而且主要定居在西方發達國家。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傳統華人遷徙地在1950年代後實際上已不再對華人開放移民了。

在新移民興起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共同的歷史背景是先後廢止了限制華人

移民的歧視性法律。繼1943年廢止著名的《禁止輸入中國勞工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後，美國於1965年通過《哈特—塞勒法案》(*Hart-Celler Act*)，給予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每年各二萬名移民配額。此後二十五年，移民美國的華人達71.1萬人(頁324)。1967年，加拿大也廢止了歧視性法律，隨後採用有利於教育程度和專業技能較高，或有投資經濟能力的申請者的計分制選擇移民。大批香港、台灣華人由此移民加拿大。1980至1990年代間，香港是加拿大移民的第一大來源地。華人集中的兩大城市溫哥華、多倫多出現中國色彩，市郊還興起了富裕香港移民的高尚社區(頁325)。1958年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逐步廢止了歧視性法律。2001至2002年度，來自中國的移民約6,700人，佔當年全部澳大利亞新移民的7.5%(頁326)。

隨着中國大陸開放出現的移民潮，後來還有一批人數上與配額移民不相上下的非法移民，或俗稱的「偷渡客」。對此，《華人》也有所討論，其中特別提及鄰近福州的長樂縣。僅僅長樂一個小縣，從1970年代後，通過各種途徑進入美國的就有多達二十多萬人，約佔全縣人口的三分之一(頁342)。這令美國移民當局和有關方面既頭痛又無奈，乃至有「中國怕美國，美國怕長樂」的民諺。

說到「怕」，孔飛力有一個看法，恐怕會引起爭議。他說美國人怕華人的原因有二：一是在經濟上拉低工資和打「黑工」(*slave labor*)；二是政治上不適合美國的民主體制(頁234)。這是天生的、種族的，還

孔飛力說美國人怕華人的原因有二：一是在經濟上拉低工資和打「黑工」；二是政治上不適合美國的民主體制。這是天生的、種族的，還是歷史的、文化的？讀畢《華人》一書，感覺作者似乎傾向於前者。

海外華人再移民者的最大來源是1975至1992年間以「越南船民」為代表的約二百萬越南、柬埔寨、老撾三國的難民。不知何故，孔飛力沒有提到美國及加拿大有大量這類再移民者。

是歷史的、文化的？讀畢《華人》一書，感覺作者似乎傾向於前者。作者提到了「中國性」(Chineseness)這一概念，而且是比較負面的(頁254)。

果如是的話，那不僅會面對「政治正確」的詰難，而且實際上美國華人內部的差異也是一言難盡。通過不同途徑——家庭、留學、偷渡，來自不同社會——香港、台灣、中國大陸、東南亞，移民者的思想作風就有差異。其中既有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崔琦等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及貝聿銘、馬友友、李安等藝術大師，也有從紐約灘頭擱淺的偷渡船上死裏逃生的難民，更多的是在中餐館裏胼手胝足營生的普通移民。而少小來美和當地出生的一代華人又有不同，其中還有近年在美國政壇上累任至聯邦政府部長的趙小蘭、駱家輝、朱棣文。

況且已在海外數世生聚、接受教育的美國華人中，有些「中國性」傳統已完全消失。當還有人拿「中國性」對他們說事時，甚至回以「去你媽的『中國性』」(Fuck Chineseness)的嗆聲^⑩。這不禁令人想起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關於民族大遷徙時代的中國「北朝漢人、胡人之分，不論其血統，只視其所受之教化為漢抑或胡而定」、「『有教無類』」的重要論點^⑪。

五 再移民

孔飛力依「他者世界」將海外華人分為三大類：「下南洋」、定居在以歐洲移民為主的國家如美、加、

澳、新的移民，以及原居海外、因逃避戰禍而被迫再移民者(頁2-3)。不論是主動抉擇還是被迫出走，華人向海外遷徙都是為了求得一個安居之所、致富之地。

書中開篇講了一個有關再移民者的小故事。2000年前後，作者在法國凡爾賽一家中餐館曾想用華語和餐館主人攀談，卻發現兩人可以交談的語言只有法語。華裔主人並不懂華語，也不知道自己的中國姓氏，只依稀記得祖上是來自中國南方沿海某地。他是從柬埔寨逃避東共清洗到法國的難民(柬埔寨曾是法國的保護國)，因為會法語，加上一點中餐知識，他便得以在不遠萬里的他鄉定居下來、開始新生(頁1)。

《華人》認為，海外華人中的第三類再移民者大部分定居在歐洲(頁3)。因為歐洲的英國、法國、荷蘭在東南亞長期殖民統治的歷史原因，早有一些原居東南亞各地、接受過西式教育的華人為躲避禍亂而再移民到英、法、荷等國。如印尼排華高峰時就有數以千計當地出生的華人逃往荷蘭(頁355)。不過，海外華人第三類再移民者的最大來源是1975至1992年間以「越南船民」為代表的約二百萬大陸東南亞的越南、柬埔寨、老撾三個國家的難民。不知何故，孔飛力沒有提到他所在的美國及鄰國加拿大也有大量這類再移民者，總數不亞於歐洲。

1975年北越軍隊攻陷南越首都西貢(今胡志明市)、1979年越軍攻入柬埔寨首都金邊，以及中國為援柬而「圍魏救趙」出兵越南北部邊境，由此引發了以越南船民為代表的二十世紀最大的海上難民潮，包

括部分從陸路逃亡泰國、中國等地的難民。這些難民的絕大多數後來被美國及加拿大接收。到美國定居的達140萬，到加拿大的有20萬，另外澳大利亞接收了18.5萬，被法國等歐洲國家接收的只佔少數，約10%上下。因越南、柬埔寨、老撾曾是法國的殖民地或保護國，到法國的三國難民共有13萬，居歐洲各國之首^⑭。這些難民中包括大量原居越、柬、老三國的華人。如1975至1979年間成千上萬地逃亡到香港的越南船民，大多數是華人，後來基本遷徙到了美國^⑮。

六 歐洲「浙江村」

歷史上，歐洲並不是移民國家，《華人》沒有敘及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的歐洲華人。從晚清、民國以來中國人寫的為數可觀的歐洲遊記中，我們知道早有華人定居歐洲。只是大量華人定居歐洲，還是近幾十年的事。這個「他者世界」的主要歷史背景是西歐大陸各國的一體化及1990年代初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的形成。

隨着從西歐開始的一體化進程，各國之間人員遷徙的限制逐步廢止，而各國對外國人定居的管制又寬嚴不一，為華人的進入、遷徙和定居提供了新的空間。此外，法國在1981年、意大利在1986和1990年、西班牙在1985和1991年先後宣布大赦非法居留者，不少華人也因此取得合法身份。到1990年，居住在歐洲的華人已超過80萬 (頁355-56)，其中很多是來自中國大陸。根據中國大陸方面的材料，從浙江省溫州

市出國到歐洲定居者至1994年就有16.5萬人，其中95%居住在法國、荷蘭、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國 (頁336)。

意大利的華人口在1990年代的十年間激增了二倍半以上，從1991年的18,770人上升到2000年的48,650人 (頁348)，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意大利對外國人居留管制較寬鬆。即便對沒有身份證明的外國居留者，只要有人僱用、自食其力，意大利當局基本上就不加干涉、允許居留。在短時間裏，意大利的托斯卡納 (Tuscany) 就出現了形同北京市郊以外來溫州人為主的「浙江村」一般的華人社區。孔飛力對托斯卡納華人社區與北京「浙江村」的內部結構和功能作了對比，認為前者乃是歐洲版的「浙江村」，雖然兩者並沒有實際的組織聯繫或傳承關係。其經營模式主要就是中國國內遐邇聞名的「溫州模式」——以家庭為單位、自籌資金、二手設備，首先利用自家的勞力以減少工資開支和以靈活作息時間從事皮革和服裝生產，以及同鄉互助和社區自治，對外盡可能少與官府往來，「悶聲發大財」 (頁338-39)。

七 小結

《華人》末篇總結說，幾百年的歷史顯示，海外華人念茲在茲的，只是安居樂業及家人福祉而已 (頁367)。「他者世界」過去曾有的「第五縱隊」的猜疑 (頁330)，以至近年泛起的「海外民國」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 的擔憂，從一個較長的歷史角度來觀察，恐怕只是一時現象，終會風吹雲散。

孔飛力對意大利托斯卡納華人社區與北京「浙江村」的內部結構和功能作了對比，認為前者乃是歐洲版的「浙江村」，雖然兩者並沒有實際的組織聯繫或傳承關係。其經營模式主要就是中國國內遐邇聞名的「溫州模式」。

幾百年的歷史顯示，海外華人念茲在茲的，只是安居樂業及家人福祉而已。「他者世界」過去曾有的「第五縱隊」的猜疑，以至近年泛起的「海外民國」的擔憂，恐怕只是一時現象，終會風吹雲散。

《華人》是孔飛力接替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哈佛教職以後出版的第三部專著。前二部專著《叫魂》和《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先後出版於1990和2002年^⑩。《華人》這第三部專著應是他十年磨一劍的精心之作。略感遺憾的是，該書的出版質量看來有點粗糙。正文378頁中，有79頁有灰影的底子，閱讀不大順眼。這些灰影是引證原始文獻，如文告、回憶、碑銘等，但書中沒有加以說明，大多數也沒有選用與正文不同的字體；而且，有個別灰影錯位，如頁349底行文字一半在灰影內，一半在灰影外。這些都是印刷質量問題，校對未有及時發現。相信以後該書會有再版的機會，似有重加編輯和訂正的必要。

註釋

- ①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陳兼、劉昶譯：《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
- ② Bradley R. Simpson, *Economists with Guns: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 and U.S.-Indonesian Relations, 1960-1968*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 ③ 胡愈之：《我的回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頁98-99。
- ④ 司徒華：《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頁104。
- ⑤ 周德高筆述，朱學淵撰寫：《我與中共和東共：赤色華人解密：東共如何興亡》(香港：田園書屋，2007)，頁1。
- ⑥ Chin Peng, *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2003), 437, 457.

⑦ Wilson Center, "Book Discussion: After Learning to One Side: China and Its Allies in the Cold War" (15 August 2011), www.wilsoncenter.org/event/book-discussion-after-learning-to-one-side-china-and-its-allies-the-cold-war.

⑧⑩ Philip Short, *Pol Pot: The History of a Nightmare* (London: John Murray, 2004), 1, Illustrations 36; 410.

⑨ 程映虹：〈以革命的名義——紅色高棉大屠殺研究〉，《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9年6月號，頁93。

⑩ Lynn Pan,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8.

⑪ Allen Chun, "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Boundary 2* 23, no. 2 (1996): 111-38.

⑫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17。

⑬ Nghia M. Vo, *The Vietnamese Boat People, 1954 and 1975-1992*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6), 2.

⑭ Yuk Wah Chan, ed., *The Chinese/Vietnamese Diaspora: Revisiting the Boat People*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36. 又據筆者任職的加拿大麥格納公司一位老撾姓氏的華人同事說，她1984年在泰國難民營改去中國姓氏，以利於通過難民資格審查。這也是「越南船民」族屬統計誤差的來源之一。

⑮ 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梁加農 加拿大麥格納公司工程師，
六西格瑪(Six Sigma)黑帶。